



宋世雄解说有绝活



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,央视在拿到转播权后,解说阵容也随之亮相。这不禁让我们想起,1978年时,中国首次通过电视转播世界杯。当时,担任解说的是宋世雄,他被誉为“体育解说界的活字典”。

显青涩,却因信息详实、热情饱满,得到了领导和听众的认可,也让他正式踏上了体育解说之路。

解说“三大赛”

在40年的解说生涯中,宋世雄亲历了无数“历史性瞬间”,其中最令人难忘的,莫过于对奥运会、世界杯、世锦赛“三大赛”的解说,每一次都用声音定格了中国体育的高光时刻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,是新中国首次全面参与的奥运会。宋世雄解说了女排决赛——当中国女排3:0战胜美国队,首夺奥运冠军时,他用近乎沸腾的声音喊道:“五星红旗升起来了!中国姑娘们创造了历史!”这句解说,伴随着女排姑娘们的欢呼,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除了奥运会,世界杯也是宋世雄解说生涯的重要战场。1978年,中国首次通过电视转播世界杯,宋世雄担任解说——当时他没有机会亲临现场,只能对着比赛录像,结合提前搜集的球队资料“隔空解说”。为了还原赛场氛围,他仔细观察球员的跑位、教练的手势,甚至根据观众的欢呼声调整自己的语气,让观众第一次“身临其境”感受到世界杯的魅力。

移动“数据库”

宋世雄的解说风格极具辨识度,高亢的嗓音、密集的信息、饱满的情感,被观众称为“宋式解说”,而这背后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专业付出。他有一个“绝活”:能在比赛中准确报出球员的姓名、号

码,甚至过往对战记录。这源于他“地毯式”的准备——每次解说前,他都会把所有参赛队伍的资料整理成“数据库”,从队员的身高体重,到最近5场比赛的得分数据,再到技术短板,无一不包。1990年北京亚运会,他解说的比赛超过100场,却每场都能做到“张口就来”,有人问他秘诀,他笑着说:“没有秘诀,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记数据。”此外,他还特别注重“现场感”的营造。解说时,他会根据比赛节奏调整语速——紧张时加快语速,让观众感受赛场的激烈;得分瞬间提高声调,传递胜利的喜悦;暂停间隙则放缓节奏,补充背景信息。这种“跟着比赛走”的灵活风格,让听众仿佛置身赛场,也让“宋世雄”三个字,成了体育解说的“质量保证”。

2000年,61岁的宋世雄正式从一线解说岗位退休,却没有离开热爱的体育事业。退休后的他,把更多精力放在了“传帮带”上,致力于培养新一代体育解说员。(摘自《良友周报》一明/文)

河野洋平去世,这位日本政治家为何被怀念

6月8日,日本自民党前总裁、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去世,享年89岁。河野洋平一生主张对华友好,深刻反省战争责任。他在历史问题上的坦诚与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执着,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。

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,是前农林大臣河野一郎之子。1967年,河野洋平首次当选众议员。1976年,他因批评自民党的“金权政治”体制退党。之后,他重返自民党。1993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,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。1994年,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。河野洋平还曾任众议院议长,是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。2009年他未参加众议院选举,退出日本政坛。

1993年,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“河野谈话”。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正式承认日军强征“慰安妇”问题、承认军方直接参与慰安所的设置与管理,并代表国家作出道歉与反省的官方声明,成为日本战后历史认知中关



于战争责任与人权侵害的标志性文件,也是中韩等亚洲国家认可的“以史为鉴”政治基础。在日本政府长期模糊、回避日军系统性强征妇女充当随军“慰安妇”的事实,河野洋平顶着巨大压力发表“河野谈话”,和“宫泽谈话”“村山谈话”共同构成了日本战后反省侵略历史的“三大谈话”。

自2006年起,河野洋平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,几乎每年都会到访中国,与中方持续交流。当下中日关系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的低谷,即便如此,河野洋平今年依旧抱有强烈的访华意愿。据日媒此前报道,河野洋平去世前正协调安排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于今年6月访华,今年6月22日至23日,日本国际贸易

促进会顺利访华。此次访问是自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,首个访华的日本经济团体。

《日本经济新闻》称,河野洋平4月接待访客时,坦言自己身染疾病,并感慨道:“家人都反对我出行,但我还是想在人生最后阶段再去一次中国。”他于5月初入院治疗,即便住院期间,心中仍牵挂着此次访华行程。

河野洋平出生那年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父母为他取名“洋平”,寄托着祈愿“太平洋风平浪静、世间再无战乱”的美好心愿。而他的一生,也正如名字寓意一般,始终矢志不渝地投身于亚太的和平外交事业当中。

河野洋平去世后,社交平台上掀起了对这位日本政治家的怀念。有网友自发留言称“河野洋平老先生,一路走好!坚决杜绝历史悲剧重演!”“非常难过,又少了一位对华友好人士”。(摘自《环球时报》丁雅妮、那晓婧/文)

雨声如故

江舟

夏夜听雨,是中年以后才养成的习惯。少年时也听过雨,却是另一种听法。雨来了,便趴在窗台上看雨点砸在水塘里,看檐水成线,看路上的人抱着古跑。那时听的是热闹——雨是雨,我是我,中间隔着距离。后来在城里住了多年,对雨的感觉渐渐钝了,空调声、车流声、隔壁装修的电钻声,把雨挤到很远的地方。直到有一年夏天,住进乡下一座老宅,才重新学会听雨。

那是一间瓦屋,屋顶十几片明瓦,雨落在瓦上,声音是活的。起初疏疏几点,像试探着敲门;然后密起来,沙沙作响,像春蚕啃桑叶;最后哗哗倾下,我



周嘉宁的长篇《永结无情游》最近成书出版了。书名取自李白的诗句:“永结无情游,相期邈云汉。”

小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场短暂的教育实验。当时青春期的“我”、陈陆、李明枝志趣相投,有着纯粹的亲密联结,但此后的人生中,似乎没有争吵和决裂,他们的人生轨迹却悄然疏离,从彼此的世界退场,音讯杳然,直到三十多年后才重新见面。

周嘉宁说,这部小说是写给老朋友、写给关系的溃散,也写给贯穿半生的遗憾与反思。书中描述的成年人的友谊,是一场充满变数的同行。

这也是书写独生子女一代的作品,他们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是:人与人关系的价值,从不在于相守终生,而在于相遇时的滋养,以及离散后仍旧留存的精神力量。《永结无情游》的精妙,在于对“无情”二字的通透注解。所谓永结无情游,是告别情谊必须圆满的执念,所有经历过遗憾,无论热烈与沉寂,其实也是人生的修行。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

父亲的竹林

这片竹林,是我父亲亲手栽下的。他离世那年,唐代贤的竹色尚浅,数十载光阴,不过一阵长风,新竹年年生发,向外层层铺展。渐渐漫成一团苍青的云烟,老屋日渐低矮,竹梢不停地往高空探。深埋泥土的根,默默写着书信。寄往邻畦,绕遍篱边。那些信写得慢,又那么长。直到有一天,邻居拂开低垂的竹枝,指着墙根拱出的根节说:“过

界了!”我蹲下来看那些暴露在外的根须。像父亲藏了多年的家书,纹路犹新。新笋已在邻家墙下顶开碎砖。忽然想起父亲名叫世泽,拎一壶老酒,叩开邻家的门。几分微醺时道出心愿:“让它翻过墙去长吧!”此后每逢清风徐来,整片竹林一同悠然摇曳,斜倚我家窗棂。也拂过邻家院墙……(摘自《重庆晚报》)

光落在初夏的枝叶上

陈泽闻

开,把天际晕成柔和的橘红。风从长街尽头吹来,掠过树梢,也拂过行人肩头,整座城市都跟着软了下来。这样的风总能轻易勾起旧时光的碎片:小时候的午后,阳光在院子地面晃出斑驳树影,刚从冰柜取出的冰镇汽水,瓶身凝着细密水珠;大人傍晚在门口乘凉,孩童追着风奔跑,风里裹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。长大后才懂,许多人和事都像季节般悄然远去,并肩走过的长街、操场边畅谈未来的夜晚,都沉进记忆深处,只等一阵熟悉的晚风将它们唤醒。黄昏的街道上,小店亮起

周末走进一家商店,看到一群孩童挑着花花绿绿的文具,喜笑颜开,真为他们的童年高兴。看着文具袋,我想起自己童年上学的三件套:书包、课本、铅笔盒。不带笔去学校,等于上战场没带武器。刚上学时家里孩子多、经济困难,买不起铅笔盒。父亲知道我爱丢三落四,就把哥哥姐姐剩下的铅笔头给我用。铅笔头容易丢,节俭的父亲便想办法收集收纳。一次他去卫生院打针,发现装针剂的小方纸盒很适合,便要了几个空盒,撕掉隔层,装上铅笔头、橡皮头,用橡皮筋一拴,一个纸质铅笔盒就诞生了。我在上面写上名字,上课郑重地掏出来,还能扎个洞立住铅笔,比同学们的都方便。

有天我随手把书包扔凳子上跑去跳皮筋,邻桌两个男孩打架,一个一屁股坐在我书包上,纸质铅笔盒当场稀烂。我心疼得流泪,却不敢声张。

三年级时,姐姐给了我一个旧铁皮铅笔盒,图案已看不清,一半铁皮塌陷,像豁嘴的老太太,但我视如珍宝,睡觉都抱着,一直用到中学。考上中学后,父亲买了新型文具盒,能装量角器、圆规、三角尺,成了我的百宝箱,更激起了学习的信心。

如今文具盒已演变成精致的拉链笔袋,物美价廉,方便更换。铅笔盒的更迭反映着时代的变迁,产品不断推陈出新,但收纳知识、追求学问的本质从未改变,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。(摘自《云南晚报》)

暖黄的灯光,水果摊摆上第一批西瓜,冰柜里的汽水正冒着凉汽,有人骑车缓缓经过,有人提着晚餐归家,风轻掀衣角,连日常都浸着安静的暖意。夜色漫上来,城市渐渐安歇,窗外树叶轻轻摇晃,远处飘来几声零散蝉鸣,天空还留着一点未褪尽的浅蓝,风从远方来,裹着初夏独有的气息,温柔掠过人间。人真正怀念的,或许从来不是某一个季节,而是枝叶上的光、晚风的温柔,还有记忆里再也回不去的傍晚。它们像初夏,不热烈却足够明亮,不喧闹,却能在漫长岁月里被反复想起。而此刻,光仍旧稳稳落在初夏的枝叶上。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铅笔盒里的流年

曹立中

